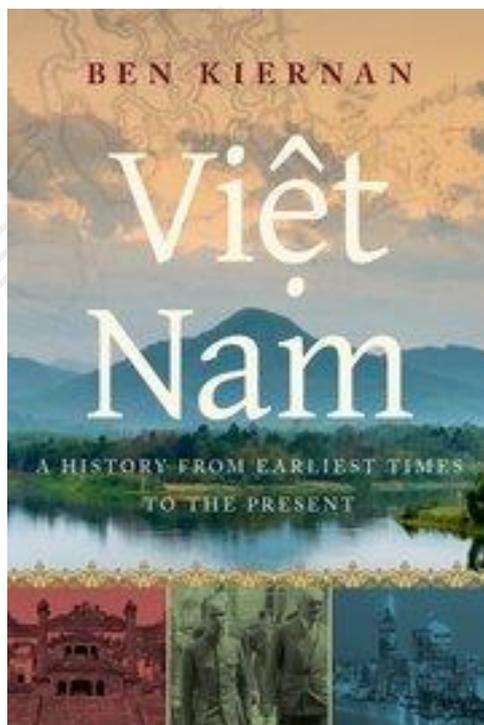


区域动态（东南亚）

越南：从古至今

编者按：从2013年到2017年，英语学界先后出版了三本关于越南的通史类专著，其中耶鲁大学教授本·基尔南（Ben Kiernan）于2017年出版的《越南：从古至今》（*Vietnam: A History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是最新的一本，同时可能也是引发最多争议的一本。本书作者本·基尔南长期关注柬埔寨史和种族灭绝，撰写一部越南通史对他而言似乎带有“跨界”的意味。针对这本书的批判也多集中在作者的语言能力和对最新研究成果的把握方面。与此同时，这本书所引发的讨论触及了英语世界越南研究的一些新观点及区域国别研究的一些核心议题。《越南研究杂志》（*Journal of Vietnamese Studies*）刊发了一系列关于该书的书评，我们从中选译了两篇，供大家参考。除了下文提及的两篇，利亚姆·凯利（Liam Kelley）、杰拉德·萨斯格斯（Gerard Sasges）等多位越南研究学者也曾撰写过多篇针对此书的尖锐评论，本·基尔南本人也做出过回应，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查阅。



《越南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Vietnamese Studies*）于 2019 年刊载了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亚洲研究讲师龚雅华（Catherine Churchman）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与亚洲研究副教授白凯琳（Kathlene Baldanza）为本·基尔南（Ben Kiernan）的新著《越南：从古至今》（*Vietnam: A History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所写的书评。原书作者本·基尔南系耶鲁大学历史学、国际和地区研究教授。龚雅华的书评编译如下：

在过去五年出版的系列单卷本越南史中，本·基尔南所著《越南：从古至今》是继基斯·泰勒（Keith Taylor）的《越南人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Vietnamese*）（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 年）和克里斯多佛·高夏（Christopher Goscha）的《新越南史》（*Vietnam: A New History*）（Basic Books, 2016 年）之后的又一新作。与泰勒和高夏不同的是，基尔南对十世纪以前的越南历史给予了更多关注，他用三章来探讨这一时期，约占全文的四分之一。三十年来，用英文出版关于十世纪以前越南北部历史的学术著作大多是文章或章节，侧重于特定的主题或较短的时段，而本书中的三章是自泰勒 1983 年出版其处女作《越南的诞生》（*The Birth of Vietnam*）（加州大学出版社）以来，用英文出版的篇幅较长且全面概述该主题的著作之一。因此，或许早该重新思考“前大越时代”（pre-Đại Việt era），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和解经学等方面产生的各种学术成果。

近年来，西方关于早期越南的学术研究开始质疑原生论（primordialist）的历史叙事。原生论认为越族人是一个自古就存在的民族，即使在中国长达千年的统治下也保持了自己的独特性和连续性。越南新生代的历史学家似乎也在朝着类似方向发展。基尔南在导言中看起来也持这种观点，他指出，“一部精准的历史需要避免追溯现代地理概念中的领土政体，避免将其应用于史前、古典甚至中世纪时代”（原书第 4 页），他还警告不要以目的论的方式叙述越南的民族性进程。然而，他却将本书的主体“越南”描述为“一个地方，一系列已成为共同领土的家园”（a place, a series of homelands that have become a shared territory）（原书第 5 页），并强调这一领土内语言和文化的连续性，我们不禁感到，通过将有朝一日会构成越南国家领土的不同省份和政体集合在一起，他难以超越当前的国家边界。从整本书的展开看来，某一特定的现代边界（中-越边界）存在感极强。虽然过去十年的学术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珠江三角洲和红河平原之间的相似之处，以及在中国控制下的低地和自治的高地社会之间的区别，但很明显，这并没有对基尔南如何看待越南历史产生多大影响，他仍认为越南的过去是本土越族人对抗中国的进攻。在这本面向普通读者的书中，

基尔南坚持采用这种在过去屡试不爽的越南历史叙事方式，这或许尚可接受，可他对这种早先的、有时甚至是过时的学术研究进行重新加工，给故事增添了更多的混乱，使叙述充满更多不准确之处。

基尔南难以阅读中文古籍的主要资料和越南语的二手资料，这对任何试图从事前现代越南研究的历史学家来说都是个大问题，因此他必须从英文和法文的译文和二手资料中构建论据。虽然收集了不少，但对这些资料的错误选用导致他将其他作者的错漏带入自己的作品中。其中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对骆越 (Lạc Việt) 生活的描述。基尔南在第 73 页引用阮登俶 (Nguyen Dang Thuc) 在《越南人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he Vietnamese People*) (1971 年) 中声称引自《后汉书》的一段话，该段号称是对公元前几个世纪雒越人生活环境和文化的详细描绘，其中提到嚼槟榔、畚田耕作、吃蟒蛇、牙齿坏死、使用骨箭等习俗。但事实证明，这一段不过是阮登述的杜撰，并没有出现在《后汉书》中，而是由散见于其他各种书籍 (如张华的《博物志》 (公元前 290 年) 中的句子拼凑而成，其中没有一句将这些习俗与被称为雒越的民族联系起来。另一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古代越南文化与水的联系，基尔南不加批判地重复黄生通 (Huỳnh Sanh Thông) 的错误说法 (原书第 24 页)，即表示水的 “nước” (孟高棉语) 和表示女人的 “nước” (中越语) 在词源上有相关性；在第 51-52 页中，他又说 “nước” 本身来源于越南语中表示女人的词 nòng，但实际上这是越南语从泰语或汉语借用的。如果能咨询一下母语人士或语言学家，或者至少查阅一下字典，他就不会在最终作品中出现这种错误。基尔南自己的原创性学术研究也暴露出类似问题：在论述史前晚期红河平原的民族和文化构成时，他把相隔数百年的各种资料混在一起，包括对远在今浙江和湖南地区的描述 (原书第 72 页引用司马迁的话)，以期这些描述能说明红河平原人的一些情况。他还沉溺于猜测一些想象中的习俗，认为红河平原独特的越族传统 “可能包括以女性性行为为重点的年度生育仪式” (原书第 75 页)。

对于那些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来说，一些细微的不准确之处更难察觉。例如，他使用诸如雒越和越这样的名称来指代历史上没有使用过这些用词的地方和时代，认为雒越人说的是一种原始越南语和南亚语系的语言，他们是今越南北半部的土著居民。尽管这种信仰仍然是越南民族史的主要内容，但关于雒越身份的看法却远非一致，甚至基尔南自己也提到这一点 (原书第 42 页)。可即使意识到这一点，他还是不合时宜地按照自己的想象使用这个词，多次暗示该词仅指居住在红河和马江地区的民族 (原书第 67-75 页)，称交趾、九真、日南为 “三个雒郡” (three Lạc commanderies)，而不是后来成为中国南方的其他地区 (原书

第 83 页），从而巧妙地将未来成为越南领土地区的人民赋予了一种有别于中华人民的统一性。他还将雒越族身份赋予在不存在这一身份的地方，并将公元三世纪的九真战士赵姬(Lady Triệu)称为“最后一位雒越统治者”，说当时的中国典籍中没有一篇提到她（但肯定是有）。上述用法歪曲了汉文典籍中“雒越”一词的实际用法，在汉文典籍中，“雒越”指的是现在中越边境两侧的民族，不仅包括红河平原，还包括今广西大片地区，只有极少数指的是生活在九真以南的民族。同样，基尔南也经常使用 Yue/Việt（越）这样的术语来称呼那些不太可能如此自称的人，而且他似乎没有关注钱德樑(Erica Brindley)最新研究（编注：指钱德樑 2015 年出版的专著 *Ancient China and the Yue*）中对该名词作为民族标志和政治术语所进行的细致讨论，也没注意到关于越南口语中较晚才使用 Việt 一词的观点，而更愿意使用鄂卢梭(Léonard Aurousseau) 1923 年关于越南人起源基本过时的看法。

基尔南对不同地理术语的混淆也会造成错误。在第 72 页，他指出“交州”（一个大型行政单位，包括今天的广东、广西和越南的北半部）和“交趾郡”（一个隶属于州的较小单位，其长官管辖红河平原）之间的区别，但随后又经常不加限定地使用“交趾”一词，从而混淆了这两个单位。更令人困惑的是，即使有所限定，基尔南并没有试图规范州（省）和郡（道）等行政单位的翻译，索引中还同时提到（不存在的）“交趾省”和“交省”，进一步混淆了问题。“交趾动乱”一节（原书第 87-91 页）最为严重，因为该节又增加了一个术语“县”。当基尔南引用后汉时期“唯交州平静，有异人来居”时，他忽略了这实际上指的是一个更大的地区（交州），包括公元三世纪中叶以前的今广东和广西，而不仅仅是红河平原上的郡。同样，当他说士燮是交趾的第六代人时，基尔南忽略了一个事实，士燮是苍梧（今广西梧州）人，的确是广义上的交州人，但并非交趾郡人，因此他与红河平原社会的联系不如后来的越南历史传统让我们相信的那么紧密。在另一处（原书第 120 页），他提到“东京总督”（Governor of Tonkin）这个一千年后才出现的地理术语。在讨论河内和广州之间土地情况的章节（原书第 104-106 页）中，“越省”一词纯属杜撰。尽管在公元前 474-523 年期间曾存在过一个以合浦为中心短命且微小的越州，但在讨论的时间段内，它已经被改名并被分割，而且可能不包括本节主要讨论的洗夫人或冯氏家族的故乡。基尔南这样描写越州的建立：“五世纪后期，朝廷将交趾从华南分离，在那里建立新省，是为越”（原书第 100 页），这也是一种错误表述。越州是从交州分出合浦郡并提升其地位而形成的新行政单位，并非“交趾从华南分离”。

基尔南的其他错误表述则可归咎于他误解了中文书面语的特点和规律以及同一个字在中文和越南语中有不同发音。例如，他说：“‘Nam Việt’这个古字最早出现于公元前 207 年（中文为南越），其越南语书面版本则是公元前 973 年”（原书第 3 页），而 Lạc 最早是“以其中文‘雒’的形式”（原书第 42 页）被记录下来的。此外，他经常无法区分中国人的姓氏和人名，在第 80-82 页中，他将汉族将军马援称为“援”，并在索引中将马援和士燮的姓氏分别记为“援”和“燮”。这些还不是姓名方面的唯一问题；对于一个刚接触越南历史的人来说，汉语姓名没有一个规范的罗马化拼写系统让人头疼。基尔南在拿不准的地方，选择让引文中的人名保持原样，然而这样就导致有些人用威妥玛拼音(Wade-Giles)，有些用汉语拼音，有些用汉越音译，还有一些奇特用法混合了不同系统，一言难尽，如“Tsai Xi” “Bakviet” 以及“Yangxi River.”。“Yue” “Việt” and “Yüeh” 三种拼法交替使用，混乱不堪。对追索参考文献感兴趣的学者来说，尾注同样一团乱麻：对中国原始资料的引用都是转引，且同一本书（以及该书不同版本）的作者姓名和参考文献拼写均各不相同。

上述例子只是本书前三章中众多事实错误、曲解和问题中的一小部分，之所以列出来是为了让出版社引以为戒。或许用书评的形式来关注小错误，而不是讨论大主题有些迂腐，但基尔南对这段历史的诸多观点都建立在这些小错误和失实陈述的基础之上。尽管原书没有提及，但从以上两段提供的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别于中国人、长期稳定的雒越社群图景是如何被构建出来的，这一社群居住在一个基本相当于越南北部、有别于“中国”，名为“交趾”的领土上。

总之，我建议在对基尔南的这本书时要格外谨慎。他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关于十世纪以前越南历史的新内容，反而因为不当选择二手资料，延续和强化了一些需要修正的观点并得出自己的错误结论。

（英文原文见：Churchman, C. (2019). Review of *Việt Nam: A History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by B. KIERNAN. *Journal of Vietnamese Studies*, 14(1), 97-103. <https://www.jstor.org/stable/26626734>. 编译转载已获授权。）

白凯琳副教授的书评编译如下：

本·基尔南按时间顺序将本书分为六个部分，探讨了十个主题。这六个部分以相关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结构命名。本评论涉及基尔南著作的中间部分，涵盖公元 940 年至 1859 年。第一部分“王国”指中国千年殖民结束后建立的国家；“地区”指这一时期越南国家最常见的名称 Đại Việt（大越）向南扩张时分为三个不同的地区。基尔南综合了大量二手文献，以及原始资料的译文和一些气候数据。他从《大越史记全书》（Đại Việt sử ký toàn thư）中提取了气候数据，参考布伦丹·巴克利（Brendan Buckley）等人在一篇关于吴哥窟消亡的文章中收集的数据，指出干旱、潮湿年份和气温变化。

鉴于越南在历史上与中国王朝的密切关系，以及中国对越南社会几乎全方位的影响，中国往往在越南研究中备受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基尔南重视占族和高棉影响很值得肯定，对南方王国和气候的关注使本书区别于其他综合性越南历史研究。

在第四章“稻米自天来”中，基尔南描述了 11 世纪占族囚犯被流放在越南时占族文化的剥离（expropriation）（译者注：参照韦伯对“剥离”的定义，指支配者占有行政手段，行政集团则只经营行政手段，而不占有它）。正如一标题所说，“温暖的天气孕育着社会变革”。基尔南认为，陈朝（1225-1400 年）恰逢中世纪暖期，粮食丰收繁荣，刺激了人口增长、廉价劳动力和社会分化。基尔南在第五章“政通人和”中认为，气候变化是导致 1340 年至 1570 年间大越动荡的主要因素之一。为重述越南所有领土的历史，基尔南接着概述了 15 世纪占婆王国的情况，以及 1470 年大越吞并占婆王国大部分领土后发生的“占婆种族灭绝”。

第四部分“地区”始于极端气候时期。第六章“内外地区”认为，由于极端气候变化、农业问题和土地缺乏、难民南下、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关系紧张以及南部港口城市的商业重要性日益增长（原书第 221-225 页），从 1500 年到 1800 年，“中央政权一再崩溃”。基尔南描述了越南采取各种措施以在洪水时引水和干旱时蓄水。他认为，1570 年到 1670 年之间的一个世纪异常干旱，导致粮食歉收，人口减少，期间也有雨水过多的年份。这一时期也是越南重心南移的时期，南方的神灵被纳入宗教活动中。占婆虽然面积大大缩小，但与其邻居内路（Đàng Trong）（越南中南部）一样，从国际贸易中获利。

第七章“另类统一”提到了内路和外路（Đàng Ngoài）南北分裂的结束，先是西山起义（Tây Sơn Rebellion）（1771-1802 年），最后被阮朝（Nguyễn dynasty）（1802-1945 年）

取代。在本章中，基尔南解密这段直至 1859 年法国人攻占两广的复杂历史。与同期的缅甸和暹罗一样，大越也因面临环境压力而崩溃。

贯穿本书中间章节的一个主题是柬埔寨试图周旋于扩张的越南和暹罗之间。内路军队曾多次干涉柬埔寨。越南人和高棉人在更广泛的湄公河地区争夺资源，经常引发暴力冲突。19 世纪，阮朝进一步向柬埔寨扩张，柬埔寨还遭受暹罗人攻击。1833 年，暹罗军队越过柬埔寨前往大越，1834 年又退回柬埔寨。军事胜利使明命帝（越南阮朝第二代君主）得以吞并柬埔寨，但之后的战争又使他不得不在 1841 年将柬埔寨让出。双方一直交战到 1847 年。

在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作品中，错误时有发生。其中一个问题涉及音译和翻译。全书使用了不同的拼音系统来处理中文词汇和名称，造成一些混乱。基尔南使用的一些翻译文本已经相当过时，包括十九世纪法文翻译的越南语文本，最初是用文言文撰写的。从文言文到法文或越南文，再到英文，翻来翻去导致术语用词不一致，以及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短语。不过话说回来，该书提醒大家需要为无法阅读古汉语或越南语原文的学生提供更多最新的越南语资料英译本。

基尔南还犯了一些差之毫厘但谬以千里的错误。例如，他说黎朝有六个部，但没有“外交部”（原书第 205 页）。事实上，和中国一样，礼部负责对外关系。书中有几处似乎暗示了儒释之间的零和竞争，从而简化了其实更为复杂的思想环境。此外本书还使用了一些不合时宜或者至少该展开解释的术语。

不管如何，该书提醒我们注意环境尤其是极端天气与国家兴衰的关系，或可启发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学者。

（英文原文见：Baldanza, K. (2019). Review of *Việt Nam: A History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by B. KIERNAN. *Journal of Vietnamese Studies*, 14(1), 103-106. <https://www.jstor.org/stable/26626735>. 编译转载已获授权。）

策划及校对：管浩

编译：杜薇

统筹审校：东南亚组